

雅斯贝斯
哲学自传

KARL JASPERS



K. JASPERS
KARL JASPERS
PHILOSOPHICAL
AUTOBIOGRAPHY

K. JASPERS
KARL JASPERS
PHILOSOPHICAL
AUTOBIOGRAPHY

K. JASPERS
KARL JASPERS PHILOSOPHICAL
AUTOBIOGRAPHY

35.1651

K. Jaspers
KARL JASPERS PHILOSOPHICAL
AUTOBIOGRAPHY

Tudor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First Edition, 1957

根据图德出版公司1957年第一版译出

雅斯贝斯哲学自传

〔德〕卡尔·雅斯贝斯 著

王立权 译 黄颂杰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19,000

1989 年 2 月第 1 版 198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7-5327-0586-2/B·013

定价：1.60 元

译者的话

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他1883年生于奥尔登堡,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在海德堡大学的精神病院工作,1913年起在海德堡大学哲学院当心理学讲师,1921年升任教授,1939年他被国社党政府免职,法西斯政权垮台后1945年在原校复职。1948年后任职于巴塞尔大学。他于1969年去世。

在本书中,雅斯贝斯说明了他进行哲学探索的道路。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介绍他的著作的那几章。他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先后介绍了他的一些主要著作的基本内容并涉及其写作背景。其中谈得较详细并立为专章的有《精神病理学》(1913)、《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哲学》(1931)、《哲学的逻辑》(1945。此书计划有四大卷,仅完成第一卷),其他一些著作如《时代的精神状况》(1930)、《理性与存在》(1945)等也附带谈及。本书结尾处有“关于我的著作的整体”一章,是他对自己一生著述生涯的全面回顾。我们可以把以上这几章看作各著作的提要,并从中探索他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作者对宗教、政治、大学教育等的观点和批判性意见也分别列为专章论述,足以帮助我们了解他探究的范围和整个思想体系的总面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思想”这一章,在全书中这一章篇幅最多,可见他对政治问题的重视。他的政治思想受马克思·韦伯的影响很深,错

误地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对法西斯主义表示了强烈的憎恨，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他攻击共产主义，这又清楚地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的顽固立场。

雅斯贝斯在本书中提到了一些给他重大影响哲学传统上的思想家，这散见于各章。此外，他也叙述了一些对他有影响的同时代的人（包括他的亲属、同事等）与他的交往。他观察敏锐，常作深刻的反思，书中勾划出这些人的精神面貌，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虽然有时未免褒贬失当（如对李凯尔特）。这些是了解他的生活、了解他的思想的来龙去脉的可贵资料。他一生中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时代所提的问题引起他的思索。从自述中可以体察到他的矛盾心理和他的探求。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达到相互真正理解，能“进行普遍的交往”，这不失为美好的愿望。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当然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但我们还能看到他的真诚的一面。

存在主义作为思维和探索人的哲学的一个历史过程已经过去。它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的进一步阐发（以及与其他思想的接触、结合）往往就是其自身本来就有的缺陷与矛盾的暴露。对雅斯贝斯的存在主义哲学也可作如是观。

译稿得到复旦大学黄颂杰先生的校订，谨此表示谢忱。

1988年3月

目 录

一、童年和青年	(2)
二、《精神病理学》	(11)
三、《世界观的心理学》	(26)
四、李凯尔特	(33)
五、《哲学》	(39)
六、恩斯特·迈尔	(46)
七、大学	(53)
八、政治思想	(63)
九、《哲学的逻辑》	(86)
十、神学和哲学的信仰	(93)
十一、哲学的世界历史观念	(101)
十二、关于我的著作的整体	(104)
十三、晚年	(118)

希尔普教授要我写一篇自述，说明我的生活经验怎样引导我去探索哲理，在这道路上我寻求什么以及我的著作是怎样写成的。对于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这一工作无论如何是合适的。因为一切哲学都是人的精神的一种活动，它的课题和它的起因都是与探索哲理的人的生活紧密地联结着的。

即使这种生活，像我的生活一样，是简朴而孤寂的，缺乏任何能引起普遍兴趣的事件，甚或缺乏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的那种足以引起旁人兴趣的事情，它与哲学的这种联结还是存在的。

虽说在日常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一切都在某一方面与哲学相关，但我将把我的自述局限于那些直接对我的著作有意义的事实，而且即使在这些事实当中我还要严加选择。这样，我将只讲述一些在我的著作中作过描写或有所反映的经历。在我感纫甚深的人中，我将不谈及在同我的友谊中向我表露自己思想的那些人，而只论述一些其思想本身对我的著作有直接影响的人。

此外，我不打算对我的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作一番全面的阐述，甚至不去论证它们的事实根据。只部分地提到它们，但绝不深入讨论其细节。这些思想将作为对生活境

遇的反应而得到解释，不过，在解释的时候，我始终抱着这样的目的，即让读者感到它们的超时间的意义。

一、童年和青年

我于1883年2月23日生于奥尔登堡，那里靠近北海海岸。我的父亲(1850—1940年)是耶弗尔区数代经商务农的家庭的后代；他当过法官，区高级警官，银行董事。他办事谨慎，忠于职守。但他的爱好却是绘画和打猎。他以自己的榜样——在一些决定性的时刻，则以他的判断——培养我，使我具备理智、可靠、忠诚的精神。我的母亲(1862—1941年)出身于祖辈务农的家庭，这个家庭从十分遥远的年代起就定居在布特亚丁根。正是她的无限的爱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的童年充满阳光，并使我们在后来的一些年代过得非常愉快。她那不竭的活力和精神使我们充满勇气和决心；她深切了解我们的目标和理想，远远超越一切世俗之见，激励我们的热情；她的智慧给我们以温暖和十分可靠的安全感。

我在文科中学学习时，与校长发生了冲突。我拒绝服从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盲目规定的校规。我的父亲是这样把我培养起来的：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希望父亲对我所提的问题都给予答复，而且也希望永远不要被迫去干任何对我来说意义还不清楚的事——即使这些事是出于对本身似乎就有说服力的传统的尊重。我既然是这样接受父亲教育的，也就坚持一个原则，即把课堂所需的必要的秩序与当时毫无理由地引入学校生活的军事纪律区别对待。一次，校长

严肃地对我说，这种态度暴露了一种叛逆精神。他说，他知道在我们家里这种叛逆精神厉害得很。他十分强烈地反对这种精神。我们之间的龃龉在我拒绝参加学校组织的三个学生联谊会中的一个时达到了顶点，这些联谊会依照大学生联谊会的模式组成的，是在校长赞许下召开的。我申述我所以拒绝参加这种“联谊会”的理由：这些团体彼此间的区别的基础是父母的地位和职业，而不是私人的友谊。我发觉自己的观点完全孤立。我的那些起先表现出对我有所同情的同学，后来竟也否定了我的看法。我的一个朋友因伴我作一星期的山间徒步旅行就遭到了他的联谊会的威胁，说要开除他，除非他不再继续和我保持友好往来。他同我谈起这件事，我劝他留在联谊会里。他也就依了我的意见。但是校长要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教师将严密监视我。我的父亲设法补偿我失去的东西。他租借了一些大猎场。从此我能够十分惬意地在非常美丽的景色中消磨我的空闲时间。

现在我要把我后来生活的外在事项简括地说一说。在这所文科中学毕业后，我被大学录取，读了三个学期的法律学。接着我又被录取为医科大学生，1908年通过国家医学考试，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以后我便开始作为（志愿）助手在海德堡大学的精神病医院工作。1913年我在该大学哲学院作为心理学编外讲师执教。1921年成为正教授，在这之前我谢绝了格赖夫斯瓦尔德和基尔大学所提供的职位。1928年我谢绝了要我去波恩大学的邀请。1937年国社党政权剥夺了我的职位；但在1945年，由于美国占领当局同意，又重新恢复了我的职务。1948年我接受了巴塞尔

大学的聘请，在该校任教一直至今。

我青年时代的内在的(即智力的和精神的)发展过程，至少该作一点简要的交待。17岁我阅读斯宾诺莎的著作。他成了我心目中的哲学家。但我丝毫不想要把哲学作为研究的主要学科或作为我的职业。相反，我怀着将来能终身从事律师工作的目的，学习了三个学期的法律。然而那种常要去涉及社会生活(这种生活我还是完全陌生的)的分心状态是那么不如人意，以致我竟然热衷于诗歌、艺术、笔迹学、戏剧，并总是将注意力转向其他事物。虽然在这种分散精力的情况中我并不快乐，但其中对伟大事物的特殊体验，特别是在艺术中的体验，却使我感到快乐。

我不满于我自己，不满于社会状况，不满于公共生活中流行的谬误的信仰。我的基本反应是：不仅人类而且我自己都有什么东西是根本错了；但与此同时，我又感觉到另一世界的伟大庄严，即自然、艺术、诗歌与科学的伟大庄严。我保留了对生活的基本信念(这是先于其他一切的主要信心)，它是我亲爱的双亲激励我的。在他们的关心里，我找到了一种安全感。我对职业的选择是我自己作出的决定。

未受人类干扰的大自然里的沉寂多么庄严！我在锡尔斯—玛丽亚(恩加丁)和北海海岸边欣赏到了这种庄严的沉寂。在意大利时对美景的静观使人欣喜若狂！在旅程中我激动极了。

但沉寂常常在我沉迷于其中一段时间后变得难忍。我感到被拉向人群。我该干什么呢？我该找到一个生活的基础；因为不论多么奇妙的特殊经验，把一个人的注意力分

散于其中都会产生毁人的后果。走向人生的具体道路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首先，我的大学学习现在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我要发现哪一种知识是可能的；对我来说，医学似乎展示了一个广阔的远景，因为它把一切自然科学和人自身作为它的研究对象。而作为一个医生我也能找到我在社会上存在的理由。

我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在1902年，当时我在锡尔斯-玛丽亚。在一封写给父母亲的便信中，我请求他们同意我由学习法律改为学习医学。我以当时我那笨拙的笔调写道：“我的计划如下：在学完规定的几个学期以后，我将参加国家医学考试。如果那时我还像现在一样相信自己具有必需的才能，我将转攻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在这以后我将首先作为一所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开业。最后我可能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从事学术工作，就像海德堡的克雷佩林^①那样——但我也多想多谈这方面的事，因为它是不确定的，完全取决于我的能力。……因此，我最好这样来表述它：我想去学习医学以求成为疗养院中的一名医生或专家，比如说一名精神科医生。对我自己，还要加上一点：其余的一切将看机会和条件。最后，一旦我有了这些机会和条件，而自己却没有勇气和信心去取得从事学术工作的必要资格，那么我也不会怨天尤人。”

我选择医学，对我来说最有重大意义的是学习实地了解情况。我竭尽所能来达到这个目的。学习上我十分勤勉，尽一切可能获得知识，心情也十分愉快。旅行中，凡有可

^① 克雷佩林(1856—1926年)，精神病医生，实验精神病学创始人。——译者

能对不同地区、各历史城市、艺术作品作直接了解的，我都尽力而为。

但在这一切中，基本的问题即人该如何生活，还是没有解决。我学习中所研求的是一些初步的东西。它作为一种职业的准备也是有用的。但这还不是生活本身。我没有去读哲学家的著作，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研究我的领域中的具体科目；虽说如此，我仍继续进行哲理探究，尽管不是系统的（即方法上不严格的）。我很快就不去听大学的哲学课。我对哲学教授感到厌烦，因为他们并不探讨那些真正对我要紧的东西。他们为人显得傲慢而又固执己见。只有慕尼黑的特奥多尔·利普斯的人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对他讲课的内容不大感兴趣，只有关于几何视幻觉的那一部分例外，他以独创的方式对这方面的知识作了贡献，但这只是心理学领域中的一个专门问题。

我生活上的一切决定都部分地为我的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所限制。我自幼体弱多病（患有支气管扩张和心脏代偿失调）。打猎时我就曾因体力不支而在僻静处伤心地哭过好几次。直到18岁，巴登韦勒尔的阿尔伯特·弗伦克尔大夫才对我的病作了正确的诊断，以前的误诊害得我常常发烧。现在我开始学习在疾病所强加于我的限制的基础上安排好我的生活。我读了鲁道夫·魏尔啸^①写的一篇文章。文章描写了我这种疾病的一切细节，并作了如下的预测：“患者最迟在30多岁时将由于脓毒症而死亡。”我这才认清治疗这种疾病真正关系到的是什么了。我慢慢地找到了一些治疗方

① 鲁道夫·魏尔啸（1821—1902年），德国病理学家，细胞病理学说创始人。——译者

法，其中一些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但假如我要像正常健康的人一样生活，实行这些方法是不可能的。我若要完成任何工作，就得冒有损于健康的危险；我若要活下去，就必须遵守最严格的戒律，避免每一种危害健康的事。我得让我的生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下去。要容忍疲劳和有害健康的事，但这常使自己的健康降到标准线之下，因此又必须不断地从这种状态中恢复过来。人总不该常为疾病所苦恼，使它变成生活中首要的事来关心。任务在于要几乎不去留意它而得当地对待它，像没有病似地工作。一切都得顺从它，但不能为它而牺牲。一次又一次地我出了差错。疾病所带来的各种限制，每时每刻都在起着侵蚀作用，我所有计划都受到它的侵害。这里我不去详尽描写我的疾病的具体治疗过程，我想在另外的场合再谈。

由于疾病缠身，我无法参加青年人的娱乐活动。徒步旅行早在我的学生时代已成了完全不可能的事。我也不能骑马、游泳、跳舞。我因体弱多病而不能劳累过度，因而也不可能服兵役，更不可能战死疆场。这正好像中国谚语所说：“多病长寿”。在常年缠病中对健康的渴求之强烈是令人吃惊的。残存的那点体力越来越明白地被意识到，给人以更大的快乐，也许甚至使人觉得比真正的健康人更健康些。

我的疾病的另一个后果是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态度，它决定了我的工作方式。由于经常发生的疾病的干扰，我要想生活得有意义，就必须生活得更全神贯注。我在进行研究时必须采取一种宽松的方式，抓住要点，依靠灵感的突发，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写出纲要。我的机会就在于尽力捕

捉每一良好时机和在所有环境中继续不断地工作。

我的疾病还有一个后果：我与公众见面只能在作出某种谨慎的预防措施后进行，而且这种见面总是很短。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由于事情重大，我才冒险出远门去作讲演和参加公众的讨论，而这往往以损害我的正常健康为代价。

最后，我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要依靠人们的亲切态度，他们允许我不顾社交礼节的形式，他们时或来作一、二小时的访问并对此感到满足。我被人误解是常事，他们把实际上属于痛苦的无法避免的事，解释成是骄傲和冷漠的表现。

我的思想的清晰性几乎没有被疾病所造成的各种压抑和限制弄得模糊起来，虽说事实上我后来终于认识了很多入，而且弗里茨·楚·洛耶成了我的朋友，但我的性格却确实被这种强加的孤寂蒙上了面纱。阴郁时时征服了我。在这种时刻我想无论如何一切都将会过去。但我更经常地真切地感到对仍有可能完成的事物的一种奇妙期望在上升着。

我的不幸早逝的朋友弗里茨·楚·洛耶和我是同乡，而且与我十分相像，因而在大学学习头几年里，我们是亲密的伙伴。学习是把我们联系起来的真实纽带。我们一起在显微镜旁做实验。我们之间交往怀着坦率的心情。他对我的病直言不讳，没有什么怜悯的静默，我从中感到了好意。不妨说他把我的病看作是干每件事时必须考虑到的因素。“今天我要去玛丽亚斯普林跳舞。你不能一道去，这对你太紧张了……”或者，就在全班作与学习植物学有关的野外旅行之前对我说：“这会拖得很久；你受不了的……”他就以这种方式来对待我被迫作出的牺牲。作为

补偿，他会以简短的描述向我报告他所看到或感受到的一切。一种可以信赖的亲切感把我们联结了起来。我们一起在慕尼黑、柏林和格丁根大学念书，与克拉格斯一道去听笔迹学的课，在阶梯教室中听讲演。他喜欢我的勤奋，轻蔑折磨我的痛苦。这是一种可爱的矛盾态度，使一切都各得其所。在格丁根，我们听了一位物理学家里克的讲演，我们尊敬他，但此外也并不特别喜欢他。他曾写过一部两卷本的教科书。我的朋友对我说：“里克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你总有一天会写教科书并成为教授的。”

在人们面前我显得超然冷漠。这是我得之于家乡地区的部分遗产。此外，它是建立在我对人们并不寄予过多希望这一事实的基础上的，又为一些偶然的失望所加强。但这种沉默寡言事实上是一种很痛苦的抑制，在我的灵魂中有着某种与之完全不同的东西。

孤独，抑郁，拘泥，这一切在我24岁时遇到格特鲁德·迈尔后起了变化。由她的哥哥陪伴着，我第一次走进她房间时的情景是难忘的！她坐在一张大书桌旁，站了起来，背仍然朝着我这个来访者，她慢慢地合上书，转过身来。我望着她，在她的平静清朗的气度中每一个动作都毫无矫饰，十分脱俗，不自觉地流露出她无瑕的纯洁和灵魂的高尚。谈话好像不言而喻地很快就转到了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似乎我们相互了解已有了很长时间。就从首次见面的这一刻起，一种无可名状的和谐存在于我们之间，它是我从未期望过会成为可能的东西。

但是，我们各自性情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格特鲁德的精神曾因受命运的残酷打击而蒙上阴影，这样的打击她

无法接受，她原以为生活的历程是一帆风顺的。她唯一的姐姐患有精神病，症状离奇，久治不愈，长期关在一所病院里。格特鲁德的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朋友，诗人瓦尔特·塞勒，则是自杀身亡的。

与我只是为疾病所苦相对照，对她来说，事物的基础本身已被撕裂，从而导出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不愿意靠幻影生活的灵魂的存在。她能在静默中长久地忍耐着。

在她那儿我的肯定人生的态度遇到了一个有个性的人，她今后将阻止我草率地听天由命。如今哲学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需要我给予深切关心的事。我们是在对哲学的追求中结合起来的，但还未达到目标。因此，经过长时期的共同生活，直到今天，我们还依然保持着对哲学的追求。

阴郁和时时会有危险袭来的意识，使她难以摆脱积虑。但是，她在场时那种无比的幸福却正是在这种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我体验到爱情所给与的深深的满足，它甚至到现在仍能使日子过得有意义。

格特鲁德出身于虔诚的犹太人家庭，从17世纪起一直住在勃兰登堡省。1907年我们相遇时，格特鲁德正在准备中学毕业考试，她打算作走读生，修完大学的各门课程。她的学习目标是哲学。她曾当过精神病患者的看护，但她所获得的经验并没有使她对这种职业感到兴趣。现在她每天在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1910年我们结了婚，一种恳挚亲切的感情和完全的信任把我和我的岳父母联系起来。岳父已消除了起初反对女儿与非犹太人结婚的嫌忌，岳母则

更坚定了对女儿的爱情前景的虔诚的希望。

在纳粹统治的年代里，我们面对周围发生的巨大不幸，屡次认为自己也难幸免，但是从来没有完全抛弃希望。我们避免了最坏的命运，好像是奇迹似地被保护着。灾祸就这样避免了，但从幸存下来这一点看，又有一种应分担罪责的内疚；面对挑战，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要正直地生活，竭尽所能地工作。

二、《精神病理学》

从1908年到1915年，我在海德堡的精神病医院工作。起初，我通过国家考试后，当实习医生，后来——中断了半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在医院的精神病科接受了一些内科学的训练——当志愿的研究助手。我一生中与合作者们配合从事于日常实际工作，仅有这几年。这期间不仅医学上的事情而且社会学、法律学和治疗学上的事情都很使人激动。

医院的院长是尼斯尔。他是一位出色的研究人员、脑组织病理学专家，他与阿尔茨海默一起阐明了麻痹症的大脑皮层组织病理学。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自我批评精神。在对精神病进行探讨的工作中，他确实大胆地希望得到一些能为科学所认可的精神病知识，但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与他的希望并不一致的一切，决不受骗。有些事情尽管使他吃惊，他却坚持强调它，甚至比对他进行批评的人更尖锐。例如，他强调指出：老年痴呆症的严重程度与大脑皮层反常区域的大小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关系。他的出发点是格里辛格尔以来通行的原则：精神病是大脑的疾病。他

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作出了重大发现，同时，却也在逐渐损害这个假设的普遍正确性。他在以谨严的方法分析他那些发现时，发觉它们的重要性是有限度的。刚当上医院院长时，他虽在组织病理学方面是专家，但对精神病的临床诊治并不熟悉。他向我们显示了，不论什么人如果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确实是科学地进行探讨并完成了科学上富有成果的研究，他就能在一切领域中很快地抓住科学上本质的东西。本来大体上以克雷佩林的教科书为基础的尼斯尔的临床讲义，也逐年变得更为独到而有创见。他向他的助手们学习；但是他看待现实的仁爱态度十分真诚，这或许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他与助手讨论时毫不矜持，没有任何地位上的歧视。尽管讨论有时可能动了感情，但也决不超越适当的礼节。尼斯尔的权威之不可动摇并不只是由于他在公务上的职位，而是由于他的人格品性。这位学者对待他的病人和助手十分宽厚仁慈；他外貌严厉，性情易怒，而在行动上则异常谨慎小心。从他身上散发出一种使人感到温暖的气氛。他为人朴实，能够忍受深切的痛苦，深信人类正处在衰败状态之中。

医院里有一些卓越的医生与他一起工作。如果出于偶然和由于失误，一个助手被录用进来，却并不适合处在这一群人中，而且会破坏这一个精神团体的不成文原则，那么，没有什么人会以傲慢的态度来对待他，他会在一段时间后自己离去。这里最主要的权威是：我的老师维尔曼斯，副院长；以下首先是格鲁赫莱，他有批判能力，有多方面的才能，有主动精神，凭这些他将一切鼓动起来；还有非常认真的韦策尔，他善于体察人情；仁爱的霍姆布尔盖尔，